

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研究

冯 静，赵先明

(西昌学院 社科系，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基本认识，并讨论了制度作为决定性因素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中的特殊地位。

【关键词】 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原因；毛泽东；左；制度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06)01-0129-04

“文化大革命”已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大事。众所周知，它是一出历史大悲剧。为了更好地认识“文化大革命”，能从根本上杜绝这种历史悲剧事件再次发生，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当事人的感知、认识中去反省和认识历史，找到问题的根源，从源头上避免这类悲剧发生。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当事人和受害人之一，因此，探索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的基本认识，对预防这类历史悲剧事件发生应该是有意义的。

一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正确的总结和科学的说明。决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产生的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的错误，特别客观地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1]这个结论的形成应该说是与邓小平多年的努力分不开，甚至可以说就是他和一批老一辈革命家长期努力的结果。在决议形成以前，邓小平在他的讲话中曾有四次明确谈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第一次是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2]第二次是在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在讲到“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时指出的。^[3]第三次（这也是谈得特别多和特别透彻的一次）是在1980年8月21日、23日，他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讲到的。^[4]最

后一次是在1981年，在决议形成期间，他和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反复讲到的。^[5]邓小平的这几次谈话，对“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作了深入、透彻地分析和客观科学的认识说明。（详见下文）

二

从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的讲话内容来看，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可以从如下两点去认识和解剖：

其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明显地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毛泽东的个人因素。这是邓小平说得比较多的一个因素。他一再强调，过去的问题中央集体有责任，但“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对此，邓小平讲了三理由：

1、毛泽东有主观动机。邓小平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出发的，是想“避免资本主义复辟。”20世纪60年代整个世界都处在大分化、大动荡、大重组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复杂，阶级斗争、政治斗争都极端剧烈，尤其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异常凶猛，生活、工作在当时的任何人对此也决不会无动于衷，更何况是有过复杂政治斗争、残酷政治斗争体验的政治家毛泽东呢？这种有过政治斗争考验的政治家对政治动态是比较敏感的，因此，邓小平这样去认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观动因，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或者说，就是当时国际

收稿日期：2006-01-10

作者简介：冯 静，(1970-)，女，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邓小平与社会历史文化问题研究。

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形势的逼迫，毛泽东才主动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2、毛泽东被革命和建设等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有骄傲的情绪，有“左”的苗头，主观上行事处世“不够谨慎”，加之“接触实际少了”，对实际情况不够了解，个人主观主义逐渐滋长，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这也是促成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犯错误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6]人在成功时免不了有骄傲的情绪，容易忽视实际，容易犯性急的毛病，我行我素，最终酿成犯大的错误。

3、封建家长制作作风余毒对他的影响。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文明古国，既有灿烂的文化也存在历史的糟粕。“朕”即国家，“朕”的意志就是法。家长制专制作风，影响着中国的千秋万代，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没有逃脱这个历史命运的作弄，晚年的他大搞个人迷信，听不进不同意见，放弃“民主集中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最终犯下了大错。

封建家长制作风这种东西，在中国有时还作为我们历史文化中的宝贵遗产被我们中国一代又一代人所继承。在家里做家长，在部门里当领导，在一个集体里当头头，经常这样想这样说还这样做——“我说了算！”忽视他人的意见，忽视他人的意志，忽视他人的利益，任意所为，错把专制当权威，错把独裁当魄力。更为可怕的是居然这种人这种做法还相当有市场，有社会基础。有人认为这才像当领导的样子。这恐怕就是毛泽东能以一己之力可以犯下滔天大错的深层要素吧！可不可以这样说，伟人的错误，除了自己的因素外，主要是与人民大众有意无意所犯下的错误分不开。

第二，“左”的历史因素。其实，这个因素在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中也是存在的，邓小平曾深刻地指出过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但是，在邓小平的论述中又似乎不止指毛泽东一人。老一辈革命家中有的也有“责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在邓小平看来，“文化大革命”就是我党“左”到了极点。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毛泽东犯“左”的错误造成的，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我们”犯“左”的

错误造成的。所以，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灾祸，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但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中央”、“集体”应该承担责任。

在人类历史上，革命者犯“左”的错误是比较普遍的。因为革命者总急于成功，总想把人们的灾难一下解除，让人们一夜过上共产主义美好生活，这就容易不顾现实而冒进。犯“左”的错误，而且“左”容易被接受，因为它表现激进。但是，“左”者由于他不顾客观现实，冒险，蛮干，莽撞，因此危害大。所以，在邓小平看来，正是由于我党“‘左’的思想的发展，所以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既是新中国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新中国历史发展“左”得十分严重的时期，时而“大跃进”，时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们被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冲昏了头，“左”成了当时的一种历史的潮，一种历史的惯力，这种历史的潮和惯力使人们意动、行乱，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就是其所造成的严重错误。

其实，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变化，有时就是受一种潮流或者说就是被某种历史潮流的惯性驱使而成为现实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1957年开始”的“左倾”潮，就没有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制度因素。这一点，邓小平是论述得最充分最深刻的。可以说，他反复强调这个因素。一会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一会又说“权力过分集中”，“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

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他甚至还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制度因素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客观的、重要的、深层的因素。“权力过分集中”是制度问题，“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整个政治生活不健康”是制度问题，“民主集中制被破坏”、“集体领导被破坏”也是制度问题。在他看来，制度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文化大革命”就是制度不完善不健全造成的。具体讲，它包括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领导制度等不完善造成的。因此，他要求我们要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

其二、“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别的一些因素。比如“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981年他在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讲“‘文化大革命’原因中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另外，在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与我们制度上的问题有关时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前一段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时“起草小组”，当然也包括中央或别的一些同志已经认识到“文革”的爆发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有关，邓小平也有这方面的看法，但由于认识还不透

或当时谈不合适，一句话，当时“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就回避算了。但事实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对“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后一段话，邓小平的“其他一些原因”是包含了哪些原因呢？除了上面那些原因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呢？其实，在我们考察认识社会历史问题时，在探索认识事物的起因时总是存在一些无法完全认识到的因素，因为有好东西藏在事物的内部，一时难以认识清楚。邓小平是一位阅历十分丰富的饱经人世风霜的杰出政治家，他应该是懂得这个历史哲学道理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他那意味深长的“其他一些原因”中，悟到、隐约摸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有多种的、复杂的要素的存在，有的只能用“其他一些原因”这类语言来代替。我们在进行历史探究中，我们会发现有些社会历史现象的构成要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的真是只可意会无法言语的（而且有的还可能是引发该历史现象的深层原因），只能用“其他一些原因”这类语言来代替。

三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7]

总结历史为的是向前看，这是邓小平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的一贯的原则立场。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无疑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原因，避免这类历史悲剧发生，推进历史进步和发展。

从上面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原因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原因很多，但根本的还是制度方面的原因。只要有好的制度，引发“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个人因素、“左”的历史因素就将被克服，“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悲剧就不会发生。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制度建立全、建设完善的国家，社会历史都比较稳定，社会历史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看来，建立好的制度，建设好制度，是解决“文化大革命”悲剧的根本出路。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曾经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如何“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在他看来，我们过去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建立不全、不够完善，有的“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

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所以,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研究,“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改革开放的现实实践建设的证实,外国专家也看到了,做了旁证。美国知名学者费朗兹·米切尔在 1990 年出版发行的《中国与马列主义危机》书上指出:“邓小平主张改革制度化”。他说,“邓小平采用一些新的法律秩序应用于党,目的不过是为了制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以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8]

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教授等在其《政治学原理》中讲到一个观点“制度建设是最大的政

治”。^[9]笔者非常赞同。的确,制度问题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在后来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程中,以“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为戒,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今天,我们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更应吸取邓小平认识和处理“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的历史经验,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使我们的社会稳定有序,使我们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早日变成现实。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龙虎网.《党旗飘扬——纪念建党 80 周年专题网站. 南京》.
 [2][3][4][5][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30、280、303、255-274、262 页.
 [7] 岳庆平主编.《中国的家与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 页.
 [8] 袁南生,伍国用主编.《中外名人看邓小平》,湖南出版社,1997 年第 2 版第 178-179 页.
 [9] 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原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5 页.

On Deng Xiaoping's Discussion about the Causes of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FENG Jing, ZHAO Xian-mi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22)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Deng Xiaoping's basic recognition of the causes of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discusses the special statu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which caused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Cultural Revolution; Cause; Mao Ze-dong; Left; System

(责任编辑:周锦鹤)